

張國淦文集

朱家溍題



# 张国淦文集

杜春和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国淦文集/张国淦著; 杜春和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2

ISBN 7-5402-1247-0

I. 张... II. ①张...②杜... III. 张国淦-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161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75 印张 540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66.00 元





张国淦先生



张国淦先生与夫人顾佶人



1914年张国淦先生与夫人及长子张英合影

一生早起，不过七点鐘，近兩日貪睡至八点鐘，即懶惰之表現，痛改痛改。

接續整理各省響應 校宣統政紀六十二至六十四

党天未，修改昨拟畧例極妥協，昌礼未，已勞動登記

今早七点半起床，尚遲半點鐘，明日要小平叫我。

連日查校辛亥<sup>革</sup>命資料，雖有所得，但於我無大益處，

以後擬半日整理舊稿，半日尋求新知，<sup>要向前</sup>不要落後，<sup>不</sup>做一年

老待死之人，古人常言，你這大年紀，求新知识，做新學問，

有何用處，我終不服，他在里弄群眾積極工作，我怕冷就在房

內書棹上積極工作，自然不能聯系群眾，發揮力量，但是，每天

看的寫的，總要配合現時實際，所謂各盡所能，我之能止此，不

空過一日，不白喫三餐而已

抹世先從  
做人起

丁亥春張國淦





# 齋倦無

碩公顯官十年身無長  
物遠東辟地恆以帝女  
治生而好學深思窮日從  
夜政，不已其達而治事  
與窮而著書皆能持以  
恆心歷久弗懈此願  
先德藉以名齋碩公屬  
補書之知其成就遠矣  
得於  
庭訓者深矣

庚午春分 張國淦識

宝熙題贈張國淦先生“无倦齋”横額



1936年张英、张瑞出国前全家合影

从左至右：张传璧、张瑞、夫人顾估人、张传玲、张英、张国淦先生、张传琬



1936年夏张国淦先生于北京家中



1959年1月张国淦先生追悼会上的花圈、挽联

考石经述方志治子殷勤老而不倦  
爱和平颂民主进步踴躍著厥志弥坚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组挽

抗日期间避居沪淞愤慨不能忘祖国  
解放以后安心写作奋裁之力振人民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现代史组

公孟数载年久仰枢榭东园著作身在此追没  
大兴克未能究成夙志

天不遗一老回健道义深在文章知己今忽凋零永  
别益令我痛又卿嗟

卿以字石荣焯

集句外高齡綜述日親親同献史宝貴資料  
卿尚未先孤子人肉猶有憾

孤孤百卷伴著墨意广搜得采圃方志学研修内  
经道去不朽地年朋偶定长珍

趙頌剛敬挽

楊吳頌农敬抄

## 编辑说明

张国淦先生一生著述等身，除已出版的《历代石经考》、《中国古方志考》、《辛亥革命史料》等专著及已发表的数十篇文章外，尚有数百万言的黑龙江史稿、经学研究、中国方志考等各种文稿，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藏室，待整理付印。

本文集限于篇幅，仅重点选录《北洋从政实录》及《潜园文稿》两部分。前者是先生历任北洋政府中枢各要职16年中的亲历见闻，所记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政闻秘要，史料价值甚高；后者是先生生前已选定历年撰写的部分经学、策论、序跋、书信及感时抒怀的诗篇，并经好友石荣璋先生编排分卷誊写，准备付印而未果的力作，是先生学术研究范围与精华的代表，不仅学术价值较高，且从未发表过。

在编辑过程中，除对《潜园文稿》中个别篇幅稍作增删外，并对全稿进行标点、分段、繁体字简化及必要的注释；同时对明显的错字加〔〕号更正、遗漏字加〔〕号补入、残缺字以□号代之等技术处理。

张传玲女士（张先生的第三女公子）为本文集的出版费尽心血，并同张嘉佩女士（张先生的孙女）与多方联系进行事宜。且提供一些重要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所长给予热情支持，并在酷暑百忙中抽时为之写序；著名历史学家蔡美

彪先生、章伯锋先生认真审阅《传略》，并提出许多宝贵修订意见；安徽教育出版社原总编辑许振轩先生，不顾暑热费时多日为本书精心审稿，阐释许多疑难问题。对以上各位先生所给予的各种真诚帮助，在此均表示衷心感谢。

杜春和

1999年7月22日

## 《张国淦文集》序

张国淦先生，字乾若，号石公，晚辈学人皆以石老相称。石老早年历任北洋政府要职，其后退归林下，埋首撰述，精研历代方志。不佞因顾颉刚先生之介，襄佐先生撰述，多蒙指引，稍得涉足于此学门槛内外。今石老文集哀集成书，行将付梓，石老女公子传玲囑不佞为文集撰写序文，不佞虽不文，亦不敢言辞，谨略摭所闻所见诸事，稍事陈述，敬告来哲。

不佞襄佐石老撰述，始于1935年秋季。其时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已蚕食我国东北三省，又越过长城，控制冀东各处。北京深感危殆，几至一夕数惊，暑假酿成芦沟桥事变，北京遂告沦陷。事变发生的翌日，不佞再至大红罗厂石老邸宅，问候安宁。石老当即囑咐不佞早日离开北京，并说日后景况将更奇涩，不能再稍留居，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地区，继续工作！石老言罢又说，他也将离开北京！石老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城后，当年北洋政府一班旧人如王克敏等，必然出来为其奔走，难免对我有所纠缠。石老说：“他们愿意去作汉奸，我可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为了避免纠缠，石老就决定早日离开北京。稍过几天，不佞再次去大红罗厂时，石老已经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就在不佞初襄佐石老撰述时，曾经听到这样的传说：石老当年在北洋政府任职时，有一件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的公文，要石老签字。石老当时说，应该请曹汝霖签。有人说，已经去过，可

曹汝霖不愿意签字。石老当时就拍桌子发怒起来，并说：“曹汝霖都不敢再卖国，怎么找到我张某人头上！”因为石老拒不签字，这事就搁置起来。这是传说，后来不佞乘间询问石老夫人，才知道这样的传说并非虚妄。这两宗事情都充分显示石老的酷爱国家，尽忠国家，忠义之气，上薄云天！

石老离开北京后，就移居天津。那时天津还有英租界，日本帝国主义不能伸手过问。石老在英租界内仍然从事撰述。稍后王克敏、汪精卫先后组建傀儡政权，不时派人劝说石老参加其傀儡政权，石老不堪其扰，因又南迁，移居上海，显示其毫不与汉奸同流合污的气概。

石老自退居林下，就埋首撰述，不再过问世事，亦少交游，和南京的蒋介石更未尝通过音问。自石老离开北京，移居天津，又移居上海，这样酷爱国家，尽忠国家，上薄云天的忠义气概，早已传遍遐迩。远居于渝中的蒋介石当亦有所闻知，因派遣人员，至上海迎接石老，来到重庆。当时在重庆发刊的《中央日报》还在头版头条刊登一篇社论，表扬石老的爱国忠忱。蒋介石当时的意思，想以高爵羁縻石老，使之留居重庆，为各方表率。可是石老并未为此动心，一周后仍返上海，料理旧日生涯。建国之后，北京重为都城，石老受党的邀请，返回北京，居于中南海，为社会科学院撰写当年北洋政府的逸事，石老是时虽已耄耋，仍不负党的雅望，使当年北洋政府逸事，得以留传于世。

石老退居大红罗厂后，埋首撰述，不预外事，也少谈往事。不过有时也不免有所涉及。石老当年曾经多次位居有关的部的总长。石老在职，事必躬亲，人多事繁，部下汇报工作，也难得多有时间。石老当时规定：汇报时五人一排，五人同时汇报，石老随手笔记，随时解答说明并布置新的工作。因而诸事并举，了无

荒疏。不佞闻听此说，颇感疑惑，竟以为这是难于办到的事情。由于襄佐石老撰述稍久，就是在石老客堂之中，曾不只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虽然不是当年部中的旧事，但不少的事故，石老仍按旧规处理，显得井井有条，并无若何杂乱之处。石老这样练达吏事，应该说是古今少有，不仅文献未见如此记载，也未曾听到其他人士这样的称道。

石老不仅练达吏事，而且善于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石老于民国初年即在北京负有重任。其时袁世凯以大总统当国，黎元洪副之，袁黎之间时有齟齬。石老鄂人，与黎有乡里之谊，故多方折冲于其间，迄洪宪称帝，黎元洪尚不至于过分委曲。其后黎元洪当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府院之争又甚嚣尘上。石老调处其间，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争端时现平泯，不至于了无转圜。石老如此缓和矛盾，使错综复杂的政局，稍得平静无波，具见匠心，在其时是获誉于人口，见重于当世的。

不佞襄助石老撰述时，为日稍久，于石老生平诸事所知渐多。这些往事，殊令人心折，敬佩之情，与日俱增。有一次，石老外出归来，说是遇到一宗奇事：有人说，书要读二次！不佞听说后，竟瞠目不知所对。不佞愚鲁，记忆力弱，就是书读二次，难得都能记住。后来才知道，石老当年读《十三经》就是只读过一次，不仅《十三经》本文，就是各家注疏，也都了然于胸怀。非只《十三经》及其注疏如此，其他文史各种载籍，亦莫不皆然。当时，不佞所居与石老邸宅比邻，其间只有一墙之隔，故得多有时间，在石老家中工作，直至晚十时许。晚间告归时，石老间亦询及，明日有无其他急办的事？若无他事，石老便说，可以说些闲话。所谓闲话，实际上都是石老在讲，不佞则是陪坐聆听。石老健谈，一支雪茄在手，就滔滔不绝。所说的都不是什么



闲话，而是在讲经论学。石老论学，多所征引，不是《尚书》、《左传》，便是《周礼》、《公羊》，间亦涉及马、班《史》、《汉》。仿佛波澜壮阔，无有涯际，直至窗外群鸡乱唱，方觉为时较久。谈罢归来，翻书勘对，乃知石老所征引者，字句间皆无差错。石老是随口征引，竟皆准确无误，在不佞看来，这应是奇迹，无由向往追踪。石老精力过人，撰述丰硕，正是有这样过人的基础。

石老早年从政，文名为政绩所掩，石老亦不自宣示，故不尽为人所知。就是后来息影林泉，埋首著述，亦多深藏篋中，不以示人。此次辑印文集，所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非就是全豹。然而石老晚年最所锺心的，则是有关方志的探索钻研，不佞为之襄佐者，也只是有关方志的部分。我国方志渊源甚早，《周礼·地官》诵训一职所执掌的即有方志。及于两汉，撰者尤多，范曄撰《后汉书》，于其《西域传》中，就以“两汉方志”相称。其后及于两宋明清，益加繁杂，小至乡亭堡寨，亦莫不各有其志书。有方志的撰述，即有舆图的绘制，两者相辅相成，可以相提并论。石老论述方志，就从追溯渊源肇始，是以《秦地图》和《辛氏三秦记》皆见于著录。《秦地图》久已佚失，《辛氏三秦记》亦仅有辑本传世。其他有关图书，率多不存于世，石老尽力钩稽，又复细大不捐，皆一一著录，了无缺漏。作者生平，原书体例，具体内容以及后世学人的著录和评论，皆广肆搜罗，著之于篇。明清时期，方志纂修，遍于各地，如前所说，乡亭堡寨亦各有其志书，石老皆一例搜罗著录，罔有遗缺。可以说自有方志成图成书以来，皆能备加采撷，汇而为一，集其大成。后之纂修方志者可以有所遵循，就是从事研讨者，也能有所依托，不必多所劳神。

钩稽搜罗，并非易事。石老对于先哲贤有关方志的撰著，莫不尽力求购，其家中所藏，宛然成一图书馆的规模。若仅就方